“扬州词曲局”考绎

卜 键

“扬州词曲局”，并非准确的故有名称，当日呼为“公局”，嘉道间扬州籍学者、内阁大学士阮元谓“两淮盐政设词曲局”，《江苏戏曲志》称为“扬州删改戏曲词馆”，研治四库纂修史、清代戏曲者颇多关注。它不是一个意在推动戏曲发展的常设机构，而出现于自古繁华、康乾两朝皇帝南巡时必加居停的扬州，“奉旨查勘违碍曲本”，由内务府系的官员主持，聘请黄文旸、凌廷堪等著名学者担纲，其内涵、外延和过程均值得考索。所感遗憾的是，《扬州画舫录》等早期记述存在模糊处，而后人在阅读和使用史料时也多有误解，应予辨正。

与其称之为一桩历时已久、至今未得到纠正的学术误判，莫若说是学界的一次集体跑偏——下了很大的力气去检索考辨，反将正确的记述给否定了。该局是特为勘办“违碍戏曲”设立的，实为四库禁书的延伸部分，饬办和主导者是乾隆帝，传谕“不可稍涉张皇”的是乾隆帝，责斥设局和查办过当的也是乾隆帝。而缘此认知这位皇帝的多变与不变，认知禁戏与禁书的关联，进而认知帝制时代谕旨与决策之差异，亦题中应有之义。

一、设局
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八月，乾隆帝在承德度过了自己的七旬大寿，命镌“古稀天子之宝”，亲撰《古稀说》，自诩“得国之正，扩土之广，臣服之普，民庶之安”，三代以下的帝王无人可比。此年也是兴修四库的第八年，为查禁违碍戏曲作品，乾隆帝对两淮盐政伊龄阿、苏州织造全德专发一道上谕：

> 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，实力查缴，解京销毁。现据各省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，因思演戏曲本内，亦未必无违碍之处。如明季国初之事，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；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，外间剧本，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，流传久远，无识之徒或致转以剧本为真，殊有关系，亦当一体饬查。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、扬等处，著传谕伊龄阿、全德留心查察，有应删改及抽掣者，务为斟酌妥办，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，一并粘签解京呈览。但须不动声色，不可稍涉张皇。至全德向不通晓汉文，恐交伊专办未能妥协，所有苏州一带应查禁者，并著伊龄阿帮同办理。[①]

［收稿日期］ 2025-08-17
［作者简介］ 卜键（1955— ），男，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，青岛 266100，bujian_2008@vip.163.com

① 《谕著一体饬查演戏剧本并传谕伊龄阿、全德留心查察》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1228 页。

清廷官制大体沿承前明，而长期将织造、税关、两淮和长芦盐政等交与内务府直辖，是其统治的一个特色。此谕明确将审查剧本的事交给二人，但以伊龄阿为主。

伊龄阿，字精一，佟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由内务府笔帖式升主事、郎中，历任九江关监督、两淮盐政、淮关监督，因事革职，四十三年再任两淮盐政，自属皇上眼中的能员。淮扬人文荟萃，伊龄阿亦附庸风雅，吟诗作赋，以擅画梅兰称名。他是在八天后接到谕旨的，次日即拜折驰送，奏曰：

> 奴才伏查外间扮演戏文，洵为太平景象，而词曲中违碍字句及扮演过当、流传失实者不一而足，诚如圣谕不可不厘剔删除，以彰教孝教忠之至意。自南宋元明至今六百余年，流传剧本甚多，书坊售卖率皆刻本，其苏扬教习人等或另有藏本未经刊刻通行者，均不可不逐细检查，以期文义明晰而扮演毫无违碍。惟是办理最宜慎密，而搜访不厌精详。奴才钦遵谕旨，当即饬委运司仓圣裔、同知张辅，率领总商江广达等设立公局，将各书坊宋元明新旧剧本详细确查，并将教习人等平日收藏新旧戏文，无论刻本抄本，概令呈缴。奴才督率该员等细加检阅，其中如有明季国初之事关涉本朝字句，及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，自当查明，应删改者删改，应抽掣者抽掣，俾智者见而知所观感，愚者闻而知所惩戒，始足以正人心而端风化。容奴才陆续查办，分别粘签恭呈御览，伏候圣训遵行。①

由此可知，伊龄阿在接到谕旨当日便着手筹设“公局”，亦即后来阮元所说的“词曲局”，时间在该年十一月十九日。折中提到的仓圣裔，时任两淮盐运使，简称“运司”，公局就设在运司衙门内；张辅为淮北盐场监掣同知，居公局中三委员之首，当属办事明练之员；至于淮盐商总江广达（名江春，广达为其行盐旗号），要协助搜访各类剧本，应也会承担一些开销。

由于路途略远，全德比伊龄阿晚一天收到军机处廷寄，也是即行上奏，积极表态，并强调已作出布置。② 十余天后，全德再次上折子，已有了较多的干货，奏曰：

> 随密遣家人赴苏城内外各书坊及惯卖戏曲脚本各铺，将一应曲本无论刻本抄本概行收买，已得二百三十七种。奴才细心校勘，今勘出应行禁止销毁者九种，删改抽掣者三种，无碍可存者二种。先行逐一粘签密封，送交伊龄阿复核汇呈，恭请圣训。其余购得曲本仍加逐细校勘，并于此外再加访购。③

奏折是一种上行公文，要求言简意赅，审慎恭敬，可字里行间仍会有性情的流露。譬如皇上已说其汉语水平不行，全德亦承认不行，可此处还是要表达自己也能校勘，认真且专业。

根据上谕精神，全德将搜集到的戏曲剧本，附上初审意见，分批解送扬州。而对伊龄阿设立戏曲审查机构之举，御批“知道了”，没有反对，亦未见明确批准。乾隆帝的谕旨算是决策吗？在伊龄阿、全德看来是的，在皇帝本人则不一定——那是一个善于联想，也常常心血来潮的帝王，想到某事便发话，急急如律令，过上一段时间又可能改变，此事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有学者认为苏州也设有词曲局，进而说苏州剧作家沈起凤任总裁，④ 证据不足。全德搜罗到戏曲剧本后，自也需要文人墨客协助审校，沈起凤为其中重要的一位，客居苏州织造全德府中，“奉旨查勘曲谱，所阅传奇不下七百余种”，身份更像是幕友。

---

①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伊龄阿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（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）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08。

②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苏州织造全德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09。

③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苏州织造全德，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10。

④ 彭秋溪：《清乾隆后期饬禁剧曲策略的调整及撤局问题——兼谈乾隆帝对戏曲的真实态度》，《中华戏曲》第55辑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60页。

二、参与人员和人数

乾隆三十八年春，各省官员为遵旨购访遗书，先后于省城设立书局，邀请有威望的学者（或在籍高官）主持，伊龄阿也是这一路数。接奉谕旨后，他很快组建了审查词曲的书局，邀集总校、分校，选调委员，支起一个审核词曲的摊子。而不久后新的旨意送达，将之与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对调，只能转任广东。

今天可看到图明阿抵扬后的谢恩折，自记上年岁末进京陛见，接到新的任命，于四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出京，二月初三日赶到扬州任所，“即于是日开印视事”，① 查禁违碍曲本的事就此由他接办。全德闻知后似乎很开心，在奏报查勘剧本的进展后加了一句：“奴才查办曲本一事，原奉恩旨著伊龄阿帮同办理，今伊龄阿调任粤省，新任两淮盐政图明阿素昔通晓汉文，奴才嗣后凡有勘出各曲本，俱封交图明阿斟酌妥办，实与公事有益。”② 内务府官员自成系统，一直有家族势力存在，团团伙伙，弄清楚不易，伊龄阿在的时候他可没这么说。
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以简明文字记述此事：

> 乾隆丁酉，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，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，凡四年事竣。总校黄文旸、李经，分校凌廷堪、程枚、陈治、荆汝为，委员张辅、查建珮、汤惟镜。③

奉旨设局之说不妥（详见后文），历经四年的记述也易生误解，其对总校、分校、委员的记载则是准确的。

这是一条颇为珍贵的史料，可与黄文旸、凌廷堪的追述相印证。而多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异议，以为遗漏颇多，兹举几例：

黄强认为：“扬州设局后，参加删改人员先后达一百零八人。昆山腔传奇创作至此时已衰落，入局人员中固然无曲学名家，但确实网罗了不少学者文人。” ④

吴书荫《书〈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〉后》将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四十六年条所附名单称为“扬州删改戏曲词馆同人”，以为总校、分校、委员共95人。⑤

出版于1992年的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，将该局称作“扬州删改词曲馆”，引据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，认为约正式成立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或稍前，“黄文旸、李经任总校，凌廷堪、程枚、陈治、荆汝为任分校；委员有：淮北分司汉阳张辅，板浦场大使长洲汤惟镜、经历查建珮，扬州朱篔、罗聘、李斗……奉新徐日吉孝廉等八十八人”。⑥

此后出版的《江苏戏曲志·扬州卷》，既有“扬州删改词曲馆”专条，也在“大事年表·乾隆四十五年”述及，称“伊龄阿奉旨，于次年即在扬州设删改戏曲词馆。聘甘泉黄文旸、江宁李经任总校，海州凌廷堪、程枚和陈治、荆汝为任分校，张辅、查建珮、汤惟镜等八十八人任委员”。⑦ 文字基本上与《江苏戏曲志》相同，沿袭了其粗疏错谬之处。

丁淑梅也援据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的委员88人说，进而论列：“被征调的曲家和文人名流有黄文旸、凌廷堪、李斗、金兆燕；还有来自江苏扬州府、淮安府、江宁府、常州府、通州等四十七人，浙江湖州府、杭州府、绍兴府、宁波府等十八人，安徽徽州府、泗州府、宁国

---

①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两淮盐政图明阿，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三日，档案号：04-01-12-0197-064。

②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苏州织造全德，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三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16。

③ 李斗：《扬州画舫录》卷5《新城北录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07页。

④ 黄强：《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》，《扬州师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1987年第3期。

⑤ 吴书荫：《书〈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〉后》，《戏曲研究》第28辑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45-246页。

⑥ 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，“扬州删改词曲馆”条，中国ISBN中心，1992年，第740-741页。

⑦ 《江苏戏曲志·扬州卷》，图表·大事年表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5页。

府等十七人；而且还有辽宁、天津、湖北、贵州、江西等地曲家也被延聘过来，具体参与戏曲检阅查勘、删改抽掣工作。”①

青年学者彭秋溪近年来对此着力甚勤，颇有发现，考明以上所列委员名单中有几位已去世，惜未能越出旧有框架，所作《清乾隆朝扬州“词曲局”修曲人员考》写道：

> 较为详备的名录，见于凌廷堪的记载，原书于凌氏在乾隆五十六年所书《手抄诸经跋》一文中，后凌廷堪弟子张其锦编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卷一“乾隆四十六年”下，移录了这份名单：曩日馆中同事者，总校：甘泉黄秋平（文旸）、江宁李理斋（经）；分校：先生及海州程时斋（枚）、丹阳荆玉樵（汝为）；委员：淮北分司汉阳张瑶村（辅）、板浦场大使长洲汤亮斋（惟镜）、经历查公（建珮）。他如扬州朱二亭（贺）、罗两峰（聘）、李艾塘（斗）、张登封（宗泰）……陈樟亭、周允中诸君，皆己亥至壬寅四年中竹西同游者。

原文将该名单全引且加考辨，实在太长，兹从略。彭文接下来说：“伊龄阿……于扬州盐政公署设立词曲局，实际上也是其揣度圣意的结果。此外，伊龄阿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，熟悉四库馆机构人员分工。扬州‘词曲局’人员，先后多达一百单九人，各有分工，堪称小型修书机构，恐怕与此不无关联。”② 应予指出的是，凌廷堪《手抄诸经跋》中未见这份名单，而揣度圣意、讨好皇上在帝制时代极为普遍，伊氏并非特别出格；至于他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，则是三年后的事情。

明光《清乾隆年间扬州词曲局委员辨正》一文，对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中相关史事颇有剔抉，对那份名单也细加辨析，已较多接近于实情，可惜的是将校勘人员与委员混为一谈，认为“扬州词曲局委员当以李斗所述 9 人最为可靠”。③

以上所引数家，失误当在于未能细读文本。其实原文中已有明确分界：“曩日馆中同事者”为一事，简记扬州词曲局组成人员，无遗漏，也无虚增；“他如”之后另起话头，详记凌廷堪在扬州（竹西）四年的朋友圈，与词曲局略无（不敢说全无）瓜葛。自古书生多孤寒，那么多人聚集扬州，寻找机会，甚焉者每顿都要找名目，亦抱团取暖，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
三、“委员”解

为什么研究者会对凌氏年谱所附名单出现误判？窃以为还在于对清朝体制不够了解，在于对“委员”二字缺少认知。丁淑梅文中甚至出现“委员会”三字，想是视为今日之编纂委员会了。明光文中对“委员”也很重视，曾加辨析，曰：

> 委员、同事涉及在词曲局中的不同身份性质。委员作为一种特定的正式身份，范围较同事为窄，即同事可能是委员，也可能不是。词曲局作为官方机构，委员当由此事的最高负责人两淮盐政委派，获得正式身份。李斗记述的 9 人，为两淮盐政正式聘任、承担剧本审读、修改工作的人员，他们职级有高低，可统称为委员。而此处 87 人，并未明言 87 人是委员，即使明言也未必可信，盖非凌廷堪的自述；况且有“他如”与第一类人员分开，且也缺少新材料证明此 87 人为委员。④

寻其语意，即以《扬州画舫录》所列黄文旸、凌廷堪、张辅等人为委员，而认为“他如”后 87 人只能算同事，参与剧本的审读、删改与缮写，并强调“此处的同事当排除乐工”。研读虽细，解释仍属牵强。

---

① 丁淑梅：《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与清代禁戏的制度化》，《文化遗产》2013 年第 3 期。
② 彭秋溪：《清乾隆朝扬州“词曲局”修曲人员考》，《文化遗产》2015 年第 3 期。
③ 明光：《清乾隆年间扬州词曲局委员辨正》，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第 28 辑，广陵书社，2023 年，第 116 页。
④ 明光：《清乾隆年间扬州词曲局委员辨正》，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第 28 辑，第 122 页。

委员，即委派办事之官吏。在很多事情上，官方都有专派的委员，如运送粮饷、监理河工、押解人犯等，皆要选派妥员负责办理。兹举《清高宗实录》中近例数则：

四十五年八月庚申（十四日），谕："伊龄阿著传旨申饬，并将该盐政曾否亲往该处督同委员启坝之处，即行据实复奏。"此委员，指委派管闸之员。

四十五年九月丙戌（十一日），传谕："据姚成烈奏准湖广督臣富勒浑等咨拿鲁之裕之孙鲁恕杰，随委员于全州将鲁恕杰拿获严搜，止有随身行李，并无别项不法书籍。"此委员，为委派抓捕人犯之员。

四十五年十月己巳（二十四日），传谕："据舒常等奏，滇省解京官犯汪圻委员徐勉称病落后，汪圻行至荆州地方，不由陆路正站行走，因与汉口较近，即托病违例船行，探视家属……汪圻著沿途督抚截拿，锁解刑部，严审治罪。解员徐勉仍遵前旨，一并解京审办。"此委员，即负责押解犯官进京之员，故又作解员。

四十五年十月庚午（二十五日），传谕："据伊龄阿奏，接奉谕旨令杨景素家属承修河堤城垣等事，督臣萨载回任尚需时日，恐伊子闻信隐寄，豫滋弊窦，当即委员会同总商详确访查。"此委员，为派令查核事件之员。

以上皆当时近例，可知委员所办的事情差别较大，而奉派专责则一。绝多委员为在职官员，属于临时差派，事毕即回原任。较为复杂之事自会增派委员，却也不可能一次委派近百人。扬州词曲局的委员，即具体管事人员，应分为采购曲本、寻访戏班抄本、审核曲本的登录收掌等项，事务冗杂，是以挑选了三人，为淮北盐场监掣同知张辅、泰州泰坝监掣官查建珮、板浦场大使汤惟镜，均属两淮盐务系统的在册职官。

委员不负责文本校勘，此其与总校、分校的原则区别。

四、主局与撤局

扬州词曲局究竟持续了多久？

《扬州画舫录》称："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，凡四年事竣。"由前所述，四年的说法是错的，图明阿的名字也被写错，而后人将凌氏年谱"四年竹西同游"名单视为与局人员，亦像是被李斗带偏了。其实考订此事之起讫并不甚难，可以借助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奏折。如前引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伊龄阿之奏，写明接旨当日（十九日）即开设公局，乃其始也。至于丁文说"扬州设立公局删改曲本的时间在谕旨下达后不久，即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之间"，似欲精细，实蹈粗疏，竟不知传旨到扬州也需时日吗？

作为扬州词曲局的创办者，时任两淮盐政伊龄阿可谓劲头十足，两个月多后向皇上奏报查勘曲本的进展，写道：

> 奴才伏查戏曲中凡事涉教忠教孝者，即或与史传稍有未符，似应略为斟酌，取其足裨劝惩，未便因有小疵遂行禁止。至于语句违碍、扮演过当者，自应详细校正，删改抽换，以期与本事不甚谬妄；惟怪诞鄙亵之词自当禁除，于以卫人心而厚风俗。现今办得《精忠记》《红梨记》《幽闺记》《玉玦记》《锦笺记》，计五种。至《精忠记》，奴才细加阅看，词曲说白每多南宋与金朝语句疵谬之处。又有《如是观》一部，查其命名之意本系愤懑权奸，推崇忠孝，凭空设想，竟属无稽，违碍语句亦复不少。前准全德来咨，此两部俱拟销毁。奴才查岳飞忠孝事实昭垂史策，即庸夫孺子亦皆熟习传闻，若遽然全行删除，恐小民竟不能洞悉岳飞本孝子以为忠臣之意。至《如是观》一部内，如"刺字""交印"及"蜡丸书"三出，均载在史书。奴才拟将此三出即并入《精忠记》部内，似觉完善，可传永久。其余四种亦俱逐细删改，毫无违碍。奴才将各戏原本粘签，改本抄录成帙，恭呈御览，伏候钦定。如蒙恩准，谨俟饬发到日陆续刊刻通行。其

原本应行销毁之处，随时移明督抚转饬地方官遵照办理，庶违碍之流弊可期净尽矣。[①]

多数修改意见当出自黄文旸、凌廷堪诸人，盐政大人作为己意，侃侃而谈，俨然半个戏曲家了。且规划宏大精密，妥帖周到，摆明了就是想表功。孰知距离造成信息的延迟，乾隆帝已有旨将之调离，朱批："此事不必行之过当，交图明阿、全德等妥为之。"真是错愕尴尬啊！不久前皇上还说让他再干一年，可转眼就变了，伊龄阿心中不快，迟迟未按规矩上折谢恩。乾隆帝心细如发，两次严厉追询，干脆连粤海关也不给他去了。[②]

图明阿的相关奏折，今日可得见四件。莅任约一个月，图明阿奏上《查办戏曲章程》，悉遵谕旨精神，提出："凡系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及南宋与金朝剧本扮演失实者，皆当遵旨酌拟改删抽掣，另缮清本，仍将粘签之原本一并进呈，恭候钦定；其余曲本，或一部中有一二处情节乖谬，恐其诳惑愚民，亦应照此办理；若但系字句偶有违碍，应即就原本内粘签改正，恭呈御览。"御批："好，知道了。此系正人心之一端，但不可过于滋扰耳。"[③]

四月初九日，图明阿呈上修订后的剧本，奏称："今办得《金雀记》等九种，并全德移来《鸣凤记》一种，奴才俱复加酌核，缮写清本，同原本粘签恭呈御览。奴才又复勘得《千金记》等十种……均系曲白间有冗杂之处，抽改无多，现在即以粘签原本进呈。"[④] 因此际甘肃回变尚未敉平，又值会试之期，诸事繁乱，乾隆帝应无暇细看，仅批了一个"览"字。而待稍觉清闲，他又取过图明阿呈送的改订曲本，阅后有些不悦，传谕：

本日据图明阿奏查办剧本一折，办理又未免过当。剧本内如"草地""败金"等出，不过描写南宋之恢复及金朝退败情形，竟至扮演过当，称谓不伦……是以谕令该盐政等留心查察，将似此者一体删改抽掣。至其余曲本内无关紧要字句，原不必一例查办，今图明阿竟于两淮设局，将各种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进呈，未免稍涉张皇。且此等剧本，但须抄写呈览，何必又如此装潢，致滋糜费！原本著发还，并著传谕图明阿、全德，令其遵照前旨，务须去其已甚，不动声色，妥协办理，不得过当，致滋烦扰。[⑤]

口风的改变，应在于皇上原无意大动干戈，孰料伊龄阿、图明阿等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竟要将古今曲本一律查勘增删，并加以豪华装潢。于是乾隆帝一怒之下，就连设局的事也不认账了。

图明阿是在闰五月十二日接到谕旨的，过了半个多月才拜折复奏：

奴才敬捧跪读，仰荷圣主谆复教导，明切示遵，奴才窃自思省，诚为过当。惟有悚惶惭悔，感谢天恩。所有上年原设之局，因附近运司衙门有闲房数间，即委员带同缮写人在内查办。今钦奉谕旨各种流传曲本不必一例查办，将来应行删改抽掣之剧已属无多，更不应仍存此局，迹涉张皇，现已即日撤去。奴才惟恪谨遵循，不动声色，督同委员于现有所有及将来续到曲本内悉心查看，凡系南宋与金朝关涉及本朝新事新编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，恐不免无识之徒转以为真者，自应斟酌删改抽掣，抄写清本，同原本粘签恭呈御览，不敢再有装潢糜费，以仰体圣主校正讹传、爱惜物力至意。其余无关紧要曲本，俱毋庸一例删改进呈，以省烦扰。[⑥]

言辞恭顺，执行坚决，也委婉说明设局与装潢规格是前任定下的。据此，截至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中旬，扬州词曲局在名义上已不存在，查勘曲本违碍之事由大铺展转向急刹车。

---

①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伊龄阿，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，档案号：04-01-01-0384-029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1123，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庚子（二十七日）："谕：前经降旨将伊龄阿调补粤海关监督，已届月余，未见伊具折谢恩，殊不可解。从前伊龄阿赍递奏折为期颇速，何以今次如此迟延？向来内外调任人员无不具折谢恩者，岂伊龄阿因由盐政调任监督不满其意，遂任意疏慢若此耶？"又二月甲寅（十一日）谕："乃伊龄阿仍佯为不知，任意迟延，是其因调任监督意存不满，即此可见。伊龄阿着传旨申饬，问其何故，即着据实回奏，且不必往粤海，令其自酌。"

③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两淮盐政图明阿，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二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20。

④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两淮盐政图明阿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九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23。

⑤ 《谕令图明阿等妥办流传剧本不得过当致滋烦扰》，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，第 1357 页。

⑥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两淮盐政图明阿，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26。

就在图明阿奏报撤局的同一天，苏州织造全德也向皇上奏报查办违碍戏曲之事，表明照常移送扬州，“统俟图明阿复核进呈”。[①] 多数内务府系的官员身段柔软，最是听话，图明阿和全德已清楚皇上的思路，立马改弦更张，此事至迟在年末就悄然结束。该年六月之后，未见到二人的相关奏折，或由于流传之失，但数量较少应属实；而图明阿在次年春突然去世，[②] 伊龄阿再回两淮盐政任，抵扬谢恩折对此事一字不提，后来亦不见涉及，应是查办违碍戏曲已了结之力证。

陆萼庭在《曲家小纪·凌廷堪》中，称“扬州的词曲局于乾隆四十八年秋撤去”，缺少依据。彭秋溪撰文批驳，引据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条所载“初，金棕亭先生与先生相见于扬州小玲珑山馆，目为旷代奇才，是年秋图直指明阿撤去词馆，因怂恿入都”，认为“凌廷堪作为分校者，其校曲工作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份才结束”，[③] 殊欠审慎。凌谱该条的“初”，应系追述语气，所说就是四十六年的事情，也间接证明当年秋词曲局已关张。盖因图明阿死于四十七年二月，不可能有秋天撤局的事。至于凌氏失去了修曲的差事，朋友怂恿其入京，从四十六年秋走到四十七年秋，恰可映照出一个穷书生的百般苦况。

在四库禁书的整体布局里，晚明的史著、诗文集属于重点，也蔓延到对戏曲剧本的审核，较早一例为《喜逢春》，出自上谕。那是在四十年闰十月，乾隆帝翻阅缴进的《遍行堂集》，发现有韶州知府高纲写的序，虽此人已辞世，仍命步军统领派员去其子高秉家中搜检，查获《皇明实纪》《喜逢春》等书籍。复因《喜逢春》一剧的作者署名江宁清笑生，军机大臣遵旨传谕两江总督高晋、江苏巡抚萨载等方面大员，命其严密查抄，“所有刷印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”。此乃查勘违碍戏曲之先声。

历史和历史人物都是错综复杂的。在审阅书稿时，乾隆帝曾极尽挑剔吹求之能事，峻急暴燥，诛戮流遣，数年内一案接着一案。从来上有所忌，下必甚之，各省督抚藩臬唯从苛细，四库馆臣及主持各省书局的文人也是严上加严。而待乾隆帝四十五年岁末饬查违碍戏曲时，禁书的高潮已过，虽不敢说乾隆帝已有所反思，不再想大动干戈应是实情。从谕令查曲本的一开始，乾隆帝就告诫“不可稍涉张皇”，接下来常批谕“此事不必行之过当”“不可过于滋扰”“不得过当，致滋烦扰”。他是故作姿态吗？从扬州词曲局的快速被裁撤，或能一窥端倪。

① 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，苏州织造全德，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，档案号：04-01-38-0205-025。

② 今存图明阿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奏折，以及二月十六日伊龄阿得旨接任两淮盐政的谢恩折，可知图明阿于其间故去，颇为突然。

③ 彭秋溪：《清乾隆后期饬禁剧曲策略的调整及撤局问题——兼谈乾隆帝对戏曲的真实态度》，《中华戏曲》第55辑，2017年，第59页。